

# 抗日战争时期国统区主要手工业概况<sup>\*</sup>

## ——试析手工业在近代中国社会经济中的地位

樊 果

**内容提要:**中国手工业是学术界高度重视的一个基本课题,但抗日战争时期的研究相对薄弱,在研究视角方面或许有进一步扩展的余地。本文尝试在工业化、现代化理念之外考察近代手工业的地位问题。通过分析抗日战争期间国统区主要手工业的发展和生产特点的延续性,结合战前手工业状况,本文认为近代手工业在社会经济中起着重要作用,是基于现实约束的一种可行、有效的要素配置方式,是吸纳农闲劳动力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抗日战争 手工业 国统区

中国手工业生产历史悠久,是传统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手工业与农业相结合是农民的基本生存方式。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经济环境发生巨大变化,手工业的发展亦受影响,但仍在国民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从产值来看,全国27种手工业产值自1914年的9.5亿元逐年增至1917年的21.6亿元,1918年和1919年各为13.8亿元和11.8亿元。<sup>①</sup>1920年中国手工业估计产值为42.6亿元,1933年为43.5亿元,1936年为100.1亿元(分别是同期近代工业化产值的4.8倍、2倍、3.5倍),年均增长率为5.5%(低于同期近代工业化产值年均增长率7.6%)。<sup>②</sup>从对外贸易来看,1910年手工开采矿产品、手工半制品和手工制成品出口值近2.5亿元,1920年3.4亿元,1930年4.4亿元,1936年2.9亿元,在当年货物出口总值中各占41.6%、40.3%、31.8%、41.7%,分别是同期机器开采矿产品、机器半制品和机器制成品出口值的2.2倍、1.7倍、1.4倍和2.9倍。<sup>③</sup>从行业来看,1933年全国15大类行业中,除水电气制造业之外其他行业均存在相当数量的手工业,据巫宝三估计,其中10类手工业产值超过机器工业产值(在10类行业工业总产值中占60.6%—99.7%),在39个分类行业中有5个行业手工业产值在对应工业总产值中占53.7%—70.6%,20个行业手工业产值超过75%。1933年棉纺业中手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10.4%,棉织业中手工业产值占86.7%,缫丝业中手工业产值占53.7%,丝织业中手工业产值占70.6%,制糖业中手工业产值占89.1%,造纸印刷业中手工业产值占67.6%,制烟业中手工业产值占42.9%。<sup>④</sup>据汪敬虞估计,1933年棉纱产量中手工业生产占25%,棉布产量中手工业生产占81%,生丝产量中手工业生产占59%,绸产量中手工业生产占75%,糖产量中手工业生产占98%,纸产量中手工业生产占83%。<sup>⑤</sup>

对于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中国手工业发展状况,吴承明等学者的研究成果中有所涉及,<sup>⑥</sup>彭

[作者简介] 樊果,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100836。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近代经济史,1937—1949”(批准号:10ZD&074)阶段性成果。

①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北京: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附录(一)。

② 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2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834页。

③ 刘克祥、吴太昌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927—1937)》,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126页。

④ 刘克祥、吴太昌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927—1937)》,第1123—1125页。

⑤ 汪敬虞:《中国近代手工业及其在中国资本主义产生中的地位》,《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1期。

⑥ 参见吴承明《论工场手工业》(《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4期),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彭南生等《固守与变迁:民国时期长江中下游农村手工业经济研究》(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等。

南生等学者分别对部分地区或部分行业进行了一定的探讨。彭南生等探讨了抗战时期政府主导下的四川手工棉纺织业的推广运动,<sup>①</sup>李中庆认为战时四川手工棉纺织业出现暂时繁荣,但不具有可持续性,<sup>②</sup>赵国壮分析了战时后方金融业与丝业发展的关系,<sup>③</sup>钟长永、鲁子健、赵小平、许桂霞、邓东林、陈洪友等学者考察了战时四川和云南盐业、广西糖业、湖南和贵州烟草业的发展,<sup>④</sup>金志焕、覃玉荣、朱英、金普森等学者分别研究棉业统制、糖和盐专卖政策的实施和影响,<sup>⑤</sup>等等。

已有成果的研究内容各有侧重,包括政府政策、市场反应和行业状况等,其研究范围多是设定在单个行业或某一地方,本文以6种主要手工业为对象进行整体性研究,以期对战时国统区手工业发展能有较为全面的认识。棉制品、盐是满足军需民用的基础物资,生丝是重要的出口创汇物资,糖、纸和烟是日常消费品,其中糖品亦是重要的战略物资,抗战时期国统区这些物品以手工生产为主。抗战期间内迁工厂数量有限,加上日军加紧对后方经济封锁,原料和产品运销均受限制,日用品供不应求,手工业相对具有一个比较独立的发展空间,本文通过考察具有典型性又不失一般性的6种主要手工业的发展状况,总结其主要特点,进而联系战前手工业相关研究,在工业化、现代化理念之外分析手工业在近代中国社会经济中的地位。

## 一、主要手工业发展状况

随着外来输入品和机制品供给的减少、军民需求的增加,在国民党统治区,棉纺织业和卷烟业有所发展;蚕丝业在抗战前期有所发展,抗战后期生丝实行统购统销,商农无利可图,川丝产量下降;抗战期间全国盐产量减少,而四川和云南年均产量略有增加;制糖业和造纸业各地发展状况不尽相同:抗战前期四川糖业和造纸业有所发展,浙江、云南和贵州等地纷纷兴办手工纸厂,福建土糖和纸产量总体减少,广西土糖产量不及战前,河南省不同土纸产量有增有减,江西土纸产量减少。

### (一) 棉纺织业

华东、华北产棉区沦陷后棉花紧缺,纱布价格上涨。为解决全国衣被问题,1940年农本局业务调整为增加布匹供应,加大对手工纺纱织布业扶助力度。1941年农本局进行重大改组,从事花纱布的运销调剂和推广手工纺织工作。1942年花纱布统制由经济部物资局管辖,采取“以花控纱,以纱控布,以布控价”的办法,向纱厂发放棉花并收回棉纱,向布厂发放棉纱并收回棉布。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提倡发展土纱和土布生产,据估计全后方“七七”机和手纺车所产棉纱共计可织布900万匹,而全部纱厂所产棉纱最多可织布560万匹,<sup>⑥</sup>后方新式纺纱机年产棉纱6.8万余件,木机及手纺年产棉纱达40余万件。战时四川先后动员手工织布机6万台,织布3亿匹。<sup>⑦</sup>成都和重庆是四川棉布重要产地,1937年重庆及近郊织布机户自1937年的420家增至1942年的576家,织布

① 彭南生等:《衣荒与应对:抗战时期四川手工棉纺织推广运动的兴衰》,《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

② 李中庆:《抗战时期四川手工棉纺织业的暂时繁荣》,《抗日战争研究》2016年第3期。

③ 赵国壮:《从丝业融资看抗战时期后方蚕丝业的发展——基于四川丝业股份有限公司融资活动的考察(1938—1945)》,《中国经济史研究》2016年第3期。

④ 钟长永:《抗日战争时期的四川盐业经济》,《盐业史研究》1995年第2期;鲁子健:《抗日战争时期的四川盐业》,《盐业史研究》2008年第2期;赵小平:《抗日战争时期云南盐业发展研究》,《盐业史研究》2005年第3期;许桂霞:《民国时期广西制糖业的发展》,《广西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7年第4期;邓东林:《抗战时期的湖南烟草》,《湖南烟草》2009年第2期;陈洪友:《试论抗战时期贵州烟草业发展模式》,《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2年第3期。

⑤ 金志焕:《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棉业统制政策》,《社会科学研究》2014年第3期;覃玉荣等:《抗战时期川康区食糖专卖政策对内江糖业的影响》,《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朱英等:《国计与民生:抗战时期川康区食糖专卖中的蔗糖定价之争》,《安徽史学》2015年第5期;金普森等:《论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盐专卖制度》,《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

⑥ 陈洪进:《手工纺织业的推进在全国经济建设上的意义》,《农本月刊》1941年5月。

⑦ 《四川工矿业近景》,《西南实业通讯》(上海版)1947年创刊号。

机自 1 973 架增至 3 238 架。<sup>①</sup>至 1944 年上期成都织布业均为机户性质,1944 年成都年产白布和花布 360 万匹,是抗战前产量的 10 倍。<sup>②</sup>璧山布业因军需增加而活跃,遂宁土布因洋布供给减少而畅销。璧山机户织机多在 6 台左右,极少的织布厂也是联合若干小机户而成或由若干小机户扩大而成。1939 年农本局在璧山设立福生璧庄,专门办理放纱收布业务,1941 年军政部设立军需署被服厂,私营机户向福生璧庄或军服厂请购或请贷机纱,福生璧庄及军服厂每月供给机纱近千件,连同黑市纱和土纱,璧山每月产布 7 万匹左右。<sup>③</sup>1944 年遂宁各纺织工厂与散机户产布约 15 万匹,连同农户所织 14.5 万匹,合计 29.5 万匹(未计与花纱布管制局交换布匹)。<sup>④</sup>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大后方袜子需求增加,而外地袜进川受阻,四川袜业有所发展。这一时期四川全省年产袜约 120 万打。<sup>⑤</sup>

安徽国民政府倡导植棉纺纱,棉纺织业以手工纺织为主,1942 年纺织工厂和染织工厂数量比 1939 年增加 5.5 倍。陕西和江西兴办织布厂社和私营小织布厂,土布生产活跃。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安徽大片土地沦陷,外地棉纱和棉布无法输入。1940 年安徽建设厅推行“一部纺车运动”以图实现民间“自种、自纺、自织”,并创办 3 家省营纺织工厂。1939 年安徽省内设立纺织工厂 12 家、染织工厂 1 家,1942 年各增至 72 家和 12 家。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安徽主要交通沿线多为日伪占据,交通阻隔加上全国性抵制日货活动使城市针织品难以进入乡镇,这为战争后方一些城镇的针织复制业提供了发展空间。据 1940 年调查,安徽全省兴办 9 家巾袜业小型工厂。1940 年成立的安徽省企业公司也下设针织工厂,1943—1945 年年产毛巾 400—530 打、袜子 600—950 打。<sup>⑥</sup>陕西为产棉区域,土布土纱产量较多,各县均为农村妇女利用闲暇纺织。抗战后外货来源减少,布匹缺乏,陕西省小型棉织厂应运而兴,1944 年全省有手工工厂 900 余家。<sup>⑦</sup>江西省建设厅所辖江西兴业公司在赣南兴办织布厂、社,私营小织布厂也得到发展,仅赣州市织布厂从 1937 年的 6 家增至 1946 年的 22 家。1945 年江西土布年产量达 5 160 万匹,其中吉安 550 万匹、新余 400 万匹、乐平 200 万匹。<sup>⑧</sup>

湖北恩施、光化、谷城等地人口增加,纱布供给不足,土布需求增加。1939 年湖北省建设厅成立手纺训练所推广手纺,1940 年改为湖北省建设厅手纺织工厂,有手纺机 30 台,月产纱 1 000 斤,宽铁机月产布 300 匹左右,窄木机月产布约 250 匹。<sup>⑨</sup>抗战前湖北光化县有纺户 500 户左右,战事爆发后纱布供不应求,土纺手织逐渐发达。1941 年光化县棉纱产量 3.2 万斤、销量 1.4 万斤,1942 年上期各为 1.77 万斤、0.8 万斤,1941 年棉布产量 2.95 万斤、销量 1.7 万斤,1942 年上期各为 1.94 万斤、1.25 万斤<sup>⑩</sup>。卢沟桥事变后工业中心沦陷,进口品输入减少,国产代用品需求增加,谷城成为鄂北各县纺织中心,年产土布约 12 万匹。<sup>⑪</sup>

云南、贵州和广西作为农村副业的手工织布较为突出。玉溪土布产量在云南省最高,年销 10 支粗纱 1.6 万大件,年产土布 420 万匹以上。河西每年销纱 1 400 大件,年产土布约 25 万匹。<sup>⑫</sup>贵州地处边陲,交通梗阻,外货输入不便,民生需用多仰赖自给,包括布料。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沦陷区部分纺织工匠流亡至黔东南,加上种植美棉产量增加和湖、桂、川棉花输入,城镇和农村出现专业

① 陈洪进:《论中国手工纺织业之经济基础及其战时趋向》,《农本月刊》1942 年第 61 期。

② 《成都市志》编委会编:《成都市志·纺织志》,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9 页。

③ 《机纱管制后之璧山棉货市场》,农本局编印:《棉业经济参考资料》第 3 期,1943 年印行,第 3—5 页。

④ 冯名书:《三十三年遂宁经济动态》,《四川经济季刊》第 2 卷第 2 期(1945 年)。

⑤ 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著:《四川省志·纺织工业志》,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45—246 页。

⑥ 安徽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安徽省志·纺织工业志》,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30—131 页。

⑦ 关梦觉:《陕西省纺织业之危机及其出路》,《中国工业》(桂林)1943 年第 19 期。

⑧ 江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江西省纺织工业志》,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04、113—114 页。

⑨ 《湖北恩施棉纺织业》,农本局编印:《棉业经济参考资料》第 13 期,1943 年印行,第 2—4 页。

⑩ 梁庆椿等编著:《鄂棉产销研究》,中国农民银行经济研究处 1944 年印行,第 403 页。

⑪ 唐正元:《鄂北手纺织业之推广》,《农本月刊》1942 年第 57 期。

⑫ 张肖梅:《云南经济》,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 1942 年印行,第 20—21 页。

纺织户,纺织厂、社增多。1944年全省各县市土布产量约320.5万匹(折合3200多万米)。<sup>①</sup>广西土布手工业分布较广,遍及全省,其中郁林和桂林分别是南北土布业中心。郁林县年产土布约20万匹,桂林布四年产量多于郁林。<sup>②</sup>

## (二) 蚕丝业

战前中国生丝产量平均每年近30万市担,其中苏浙、广东和四川各占50.4%、26.8%和10.6%。战时主要蚕桑区域沦陷,桑园和设备多遭毁坏,产量仅占战前约1/10,其中四川和苏浙各占64%和20%。<sup>③</sup>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和四川省政府采取低息贷款、增加投资、实行奖励等方式扶持蚕丝生产,1937—1940年四川生丝年产量约1200吨,其中土丝产量在780—1121吨(约占85%)。太平洋战事爆发后,同盟国对生丝需求迫切,为增加生产、统一收购,1943年政府颁布全国生丝统购统销办法,全国所产内销外销改良丝和土丝的收购运销由财政部责成贸易委员会所属的复兴商业公司统一办理。国外丝市因英美限价、国内市场因法定汇率折价所限,收购价格压低,产量减少。1941—1945年川丝年产量在1000吨左右,其中土丝在768—965吨。<sup>④</sup>

表1 1937—1949年四川厂丝和土丝年产量 单位:吨

年份	厂丝	土丝	合计	年份	厂丝	土丝	合计
1937	89	1121	1210	1942	131	958	1089
1938	160	1050	1210	1943	125	903	1028
1939	429	780	1209	1944	113	854	967
1940	121	1088	1209	1945	139	768	907
1941	124	965	1089				

资料来源: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著:《四川省志·丝绸志》,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年版,第155—156页。

1941年四川乐山产绸量6万—7万匹,是战前产量的2—3倍,1942年增至10万—15万匹,南充城乡产绸量超过15万匹,1942年西充产绸量占乐山同年产量的1/10左右。<sup>⑤</sup>1944年乐山全县织机仅有1300余部,比1941年减少1/2以上,成都丝绸业机房仅剩220家,比抗战前减少1/4以上。<sup>⑥</sup>

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贵州成为大后方,人口骤增,贵州省政府倡导发展丝织业,1938年全省产丝约10吨,1942年增至约70吨。<sup>⑦</sup>抗日战争时期皖南手工丝纺织业一度复苏。绩溪设开源、大仁等4家丝厂,旌德设模范织绸厂(1939年改为皖南纺织示范工厂)。1941年安徽企业公司成立,内设屯溪丝织厂,1942年产绸合计近1000匹、平均约70余匹、丝袜160余打。<sup>⑧</sup>

## (三) 制盐业

战时沿海盐区大部分沦陷,国民政府将内地各省食盐销量分配至川、滇等盐区,制定扶持和奖励办法,鼓励食盐增产以满足抗战时期军民需要。抗日战争期间全国盐产量比战前减少1/3到1/2,而四川年均盐产量比战前增加近1/4,约占全国产量的1/2,其中自贡占四川产量的1/2以上。1937年四川省各盐场产盐约707万担,1938年达840万担,1939—1941年均超过930万担,其中自流井场和贡井场产量合计从300多万担增加到500多万担。1942—1945年四川盐产量自930万担减至845万

① 何辑五:《十年来贵州经济建设》,南京印书馆1947年版,第113—116页。

② 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广西通志·二轻工业志》,桂林:广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3、15、175页。

③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第4卷,北京: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484页。

④ 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著:《四川省志·丝绸志》,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年版,第155—156页。

⑤ 姜庆湘、李守尧:《四川蚕业》,四川省经济研究处1946年印行,第66页;李守尧:《四川之蚕业概述》,《四川经济季刊》第2卷第3期(1945年);钟崇敏、朱寿仁:《四川蚕丝产销调查报告》,中国农业银行经济研究处1944年印行,第221页;尹良莹:《四川蚕业改进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338页。

⑥ 刘敏:《三十三年四川之工业》,《四川经济季刊》第2卷第2期(1945年)。

⑦ 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贵州省志·轻纺工业志》,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8页。

⑧ 安徽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安徽省志·纺织工业志》,第108—109页。

担,自贡盐产量在 452 万—505 万担间波动,1938—1944 年自贡盐年销量较为稳定,1945 年比 1938—1944 年年均销量减少 30.6%。<sup>①</sup>

表 2 1933—1945 年盐产量

年份	全国盐产量(万担)	四川盐产量占全国比重(%)	自贡盐产量占四川比重(%)
1933—1937 年平均	4228	17.4	45.5
1939	2125	43.4	54.6
1940	2495	39.4	52.7
1941	—	—	53.6
1942	2177	42.7	51.2
1943	2508	35.1	51.3
1944	1660	51.6	56.7
1945	1323	63.9	59.7

资料来源:赵国社:《抗战时期自贡井盐业场商融资问题研究》,《盐业史研究》2015 年第 3 期。

云南井盐使用锅煎土法,1937 年以前云南盐产量不超过年定额 100 万担。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缅甸和越南私盐减少,粤盐来源断绝,川盐移销湘、鄂,加上战区扩大,云南人口增加,云南各井场盐产量自 1939 年的 88 万担增至 1940—1941 年的 110 多万担。抗战后期因人工被征、雨季多雨导致较低井硐进水等原因,1942—1944 年盐产量减少,1945 年仅 86 万担,但普遍高于抗战前数额。<sup>②</sup>

#### (四) 制糖业

1919 年四川糖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 75%,后因多种原因占比下降,但至抗日战争爆发时仍占 44%,抗战期间川糖地位再次上升,约占全国产量的 1/2。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日本封锁导致中外交通受阻,外糖输入四川困难,加上广东、福建等省的糖不能内运,川糖市场竞争对手减少,同时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人口的增加提高了糖的需求总量,此外大批厂矿迁入四川,汽油缺乏故多以酒精代替作为燃料使用,糖的副产品漏水可作为酒精原料,这些因素促使四川糖业有所发展。四川沱江沿线是川糖重要产区,产量占全川的 70%,蔗糖业多使用土法。

川糖产量自 1935 年和 1936 年的不足 100 多万市担增加到 1937 年和 1938 年的 200 多万市担,1939 年因旱灾产量减少,1940 年超过 300 万市担。宜昌沦陷后四川与两湖间交通受阻,1940 年起粮食价格上涨,种杂粮收益高于种甘蔗收益,一般种蔗农户改种杂粮,1942 年糖类实行专卖,食糖专卖机关对糖价调整迟缓,核价过低,<sup>③</sup>蔗糖产量下降,1941 年川糖产量减至 200 多万市担,1942 年和 1943 年不足 200 万市担。<sup>④</sup>

江西赣南是全国著名土糖产区之一,抗日战争期间赣南糖产量为 110 万担。<sup>⑤</sup> 广西制糖业多采用牛拉石碾取汁、开锅煮糖的土法制糖,20 世纪 30 年代前期糖产量约占全国同期产量的 1/8,湘桂铁路建成通车后农村土糖生产有所发展,1935 年和 1936 年超过 100 万担,1937—1941 年在 60 万—100 万担,占全国糖产量的 1/10 以上。<sup>⑥</sup> 土法制糖业是云南农村的重要副业,1934—1938 年迤西 13 县、

① 赵国社:《抗战时期自贡井盐业场商融资问题研究》,《盐业史研究》2015 年第 3 期;四川盐业工会筹备委员会编印:《四川盐业概况》,1942 年印行,第 13—15 页;宋良曦:《自贡盐业在抗战经济中的作用和贡献》,《盐业史研究》1995 年第 3 期。

② 赵小平:《抗日战争时期云南盐业发展研究》,《盐业史研究》2005 年第 3 期。

③ 据估计,1942 年每市斤白糖、桔糖、糖蜜各亏折 1.4 元、1.3 元、0.8 元,各占生产成本的 10%、21%、24%,计入产品占压资金的机会成本,亏折更多。李汉文:《现阶段之四川制糖工业概况》,《西南实业通讯》第 8 卷第 1 期(1943 年)。

④ 朱吉礼:《四川蔗糖业的危机》,《四川经济季刊》第 3 卷第 1 期(1946 年)。

⑤ 《江西省轻工业志》编纂委员会编:《江西省轻工业志》,北京:方志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7 页。

⑥ 许桂霞:《民国时期广西制糖业的发展》,《广西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7 年第 4 期;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广西通志·糖业志》,桂林: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 页。

迤南 15 县和迤东 4 县合计 32 县平均每年产糖 3 700 万余斤。<sup>①</sup> 福建著名产糖地有福安等 20 县,早期闽糖运销全国,后因洋糖倾销而产量减少。洋糖进口关税提高后,加上海口封锁,闽糖渐见起色,基本全为土糖。1935 年和 1936 年福建土糖年产量在 4.4 万—5 万吨,1937 年增至 6.1 万吨,1938—1941 年自 4.6 万吨减至 1.3 万吨。<sup>②</sup>

表 3 1934—1943 年四川、广西和福建糖产量

	四川糖产量(万担)	广西糖产量(万担)	福建土糖产量(万吨)
1934	—	72	—
1935	179.5	108	4.4
1936	138.9	120	5.1
1937	219.4	66.55	6.1
1938	259.4	61.47	4.6
1939	165.5	89.8	2.9
1940	327.3	100.1	3
1941	220.9	91.55	1.3
1942	166.9	—	—
1943	181.8	—	—

资料来源:朱吉礼:《四川蔗糖业的危机》,《四川经济季刊》第 3 卷第 1 期(1946 年);许桂霞:《民国时期广西制糖业的发展》,《广西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7 年第 4 期;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福建省志·轻工业志》,北京:方志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53 页。

### (五)造纸业

抗战前洋纸比手工纸物美价廉,四川手工纸逐渐被淘汰,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洋纸减少,加上文化用纸需求增加,价格上涨,各地槽户纷纷开工或增产。四川省年纸产量约 2.18 万吨,夹江、梁山、铜梁和广安 4 县合计 1.8 万吨,占总产量 80% 以上。抗战时期夹江常年产纸 6 000—7 000 吨,年产高时约 8 000 吨。<sup>③</sup> 七七事变前梁山年产纸 7 万担,事变后跌至 4.2 万担,1938 年后逐渐推广手工造纸,1939 年产纸约 9.8 万担,1940 年 12 万担。1937 年铜梁白纸产量 2.2 万余担,草纸 5 万余担,纸壳约 0.32 万担,1938 年和 1939 年年产白纸 3 万—4 万担。1941 年粮价上涨、人工伙食增加,而纸价并未按比例提高,梁山 90% 以上槽户被迫停工,当年产纸 9 000 多担,铜梁一些纸厂相继停业。<sup>④</sup>

抗战初期浙东各海口如宁波、温州等埠与外地贸易尚未中断,洋纸尚可输入,当时土纸未经改良(不适用于印刷),内外均无销路,价格大跌,纸户关闭,产量锐减。1938 年下半年后洋纸进口困难,纸价高涨,社会日用纸张严重短缺,各地纷纷呼吁改良土纸。1938 年浙江新登、龙游等 31 县手工纸产量为 244 万件,1939 年富阳、永嘉等 47 县手工纸产量为 967 万件,产纸县县均手工纸产量和产值比 1938 年增加约 1.5 倍。<sup>⑤</sup>

福建省造纸业素来兴盛,1936—1937 年全省 47 县槽户年产纸 80 多万担,1938 年减至 62 万担。日军入侵厦门后洋纸中断,加上消费量增加,福建省内纸业逐渐复兴,1939 年产纸 89 万担,后逐年减至 1943 年的 1.4 万担。<sup>⑥</sup> 粤北南雄是广东省手工造纸区之一,据 1941 年统计,南雄一地年可产竹纸超过 20 万担。1942 年烟叶价格上涨,贷款于手工造纸的游资转向烟叶,加上造纸成本大增,南雄造

① 曹立瀛、刘辰:《云南之糖业》,中华民国资源委员会经济研究室 1940 年印行。

② 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福建省志·轻工业志》,北京:方志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53 页。

③ 华有年:《夹江的纸业与金融》,《四川经济季刊》第 1 卷第 3 期(1944 年);《四川工矿业近景》,《西南实业通讯》(上海版)1947 年创刊号。

④ 钟崇敏等:《四川手工纸业调查报告》,中国农民银行经济研究处 1943 年印行,第 61—67、107—115 页。

⑤ 顾文渊等编:《浙江经济统计》,浙江地方银行总行 1941 年版,第 124—126 页。

⑥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第 4 卷,第 338、340、344 页。

纸业一落千丈,1943年南雄全县手工造纸产量自1940—1942年的12万—14万担减至3万担。<sup>①</sup>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河南省造纸业仍停留在手工造纸阶段,生产麻纸、粗纸和火纸等土纸。1937年河南省麻纸产量719万捆、粗纸44万斤、火纸22万斤,1938—1940年麻纸产量跌至不足70万捆,1941—1945年更跌至15万—24万捆,1938—1945年粗纸年均产量比1937年增加92%,火纸年均产量增加36%。<sup>②</sup>江西历为中国手工纸产地。1934年江西全省产纸县有53个,其中44县纸业总产值495万元,1935年和1936年各增至519万元和614万元。1937年后纸张成本不断上涨,弋阳、玉山、上饶县等地许多槽厂相继倒闭,土纸产量减少,1940年江西17县手工造纸业有30余家。<sup>③</sup>

## (六) 卷烟业

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平汉铁路被拆撤,河南所产熏烟叶难以外运,大多售与小规模卷烟工厂,手工卷烟厂遍布城乡。1942年河南省手摇铁机约330部,每部每小时可卷烟8000支,手工卷烟木斗约500部,每部每天可卷烟2200支,合计全年可卷烟20万余箱(每箱5万支)。<sup>④</sup>抗战期间沦陷区不少烟厂关闭,外烟输入困难,加上商贾和难民流入安徽、江西、广西、贵州等,家庭卷烟户和手工卷烟厂兴起。1940年安徽阜阳城手工卷烟店铺超过500家,蚌埠小卷烟厂(场)和作坊最多时达340家,亳县卷烟作坊100多家。<sup>⑤</sup>据不完全统计,1940—1945年江西景德镇、新余、抚州、吉安、赣州等地开办手工卷烟厂400余家。<sup>⑥</sup>1938—1944年间桂林新建烟厂41家,全市烟厂达66家,20世纪40年代梧州手工卷烟厂近30家。<sup>⑦</sup>1941—1944年贵州手工卷烟厂社自17家增至45家,多集中在贵阳。<sup>⑧</sup>20世纪40年代昆明手工烟厂约15家,玉溪县手工卷烟较为突出,仅玉溪州城手工卷烟作坊就超过10家,<sup>⑨</sup>鹤庆县有纸烟制造所300余家。<sup>⑩</sup>

1940年浙江省准许商民集资雇员设厂和组织手工卷烟厂社,各地纷纷开设以地产晒烟作主要原料的小型烟厂。1940年后温州卷烟厂户多达七八十家,1942年衢县城乡约有15家卷烟厂社,1944年江山手工卷烟厂社约有20家,常山县也有手工卷烟厂近20家,1942—1945年丽水城区成立5家卷烟厂社,龙泉县有不少难民生产自救的临时手工卷烟厂,缙云县先后有手工卷烟户65家,绍兴嵊县城乡相继开设手工卷烟社120余家。<sup>⑪</sup>20世纪20年代广东出现手工卷烟作坊,价格低廉有一定销路。抗战期间外来卷烟短缺,广东各地纷纷兴起私人卷烟作坊和店铺。1930—1945年间广东土制卷烟最高年产量达10万箱(5万支装)。<sup>⑫</sup>1937年福建漳州和龙岩等地若干县市、1939年闽东霞浦和古田等县相继发展手工卷烟业,20世纪40年代手工卷烟厂、坊遍及福建全省各地。<sup>⑬</sup>

## 二、手工业生产特点的延续

不少学者对鸦片战争后至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前的手工业进行了深入研究,本部分将抗战时

① 陈信友:《南雄造纸工业的厄运》,《中国工业》(桂林)1944年第26期。

② 河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河南省志·造纸、印刷、包装工业志》,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10页。

③ 江西省政府建设厅编印:《江西省各项概况简明图表》,1940年印行,第27页。

④ 陈洪友:《民国时期河南手工卷烟研究(1912—1949年)》,博士学位论文,南京大学,2012年,第57页。

⑤ 安徽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安徽省志·烟草志》,北京:方志出版社1998年版,第59页。

⑥ 《江西省烟草志》编纂委员会编:《江西省烟草志》,北京:方志出版社1998年版,第65—66页。

⑦ 广西烟草行业志编纂委员会编:《广西烟草行业志·广西烟草志》,桂林:广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4—182页。

⑧ 贵阳市志办《金筑丛书》编辑室编:《民国贵阳经济》,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232页。

⑨ 云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总纂,云南省烟草公司编撰:《云南省志》卷20《烟草志》,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86—188页。

⑩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第4卷,第265页。

⑪ 《浙江烟草志》编纂委员会编:《浙江烟草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1—163页。

⑫ 广东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广东省志·烟草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20—121页。

⑬ 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福建省志·烟草志》,北京: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82页。

期国统区主要行业手工业生产特点与关于战前的相关研究对照,从中可以看出手工业生产特点具有延续性。

### (一) 产品满足不同规模的市场需求

史建云、彭南生、李金铮等学者通过对抗战前手工业的研究指出,因手工业品和机制品之间的性价比差异和不同的消费偏好,市场上持续存在对一些手工业品的需求,手工业生产主要以市场为导向。<sup>①</sup> 战时国统区6种主要手工业生产满足不同规模的市场需求,产品在本地、邻县、附近省市、多省市以及国外市场销售。

省、市、县间的商品流通。棉纱、棉织品、纸和卷烟均存在跨地区和跨省销售现象。成都棉纱每年用量中土纱占80%,大部分由三台、中江、遂宁等处供给,小部分就地纺制,<sup>②</sup>湖北谷城县土纱供应鄂北各县,并行销巴东河南南阳一带。<sup>③</sup> 云南玉溪土布除销售各县外大量运至昆明市场,河西土布销于本县、昆明及附近各县,蒙自土布多销售邻近各县。<sup>④</sup> 陕西土布售与陕甘宁青各地。安徽六安县桥头集所产毛巾和袜子行销大别山区。<sup>⑤</sup> 夹江小作坊造纸产品运销于成都、重庆等市及陕西、云南一带。<sup>⑥</sup> 赣西北竹子纤维造纸运销河南及长江中游沿岸。广西隆山纱纸销往宾阳、柳州和南宁等地,都安纱纸大部分销往省外和香港。成都手卷纸烟多销于附近各州县,市场上除本地烟厂产品外,主要是豫烟;中江手工卷烟运销四川全省,也有运至西安、兰州。浙江省庆元县手工烟厂产品行销本县和福建松溪、政和等地,嵊县城乡手工卷烟社产品行销本县及东阳、义乌、宁波、杭州等地。

国统区范围内的商品流通。盐和糖产地相对集中,产品运销多省的现象可以川盐和川糖的产销为例进行说明。四川盐产量和糖产量在全国占重要地位。战时沿海盐区大部分沦陷,国民政府将内地各省食盐销量分配至川、滇各盐区和浙、闽、粤未被侵占的盐场,1938年政府取消对川盐的限制,鼓励增产加运,1939—1943年四川盐产量占全国比重自战前17.4%提高到40%左右,1944年和1945年超过50%。<sup>⑦</sup> 抗战期间川糖约占全国产量的1/2,一部分销售本省,其他从产区水运至宜沙,转销两湖。其他如赣南土糖,大多销往湖南、湖北、安徽等省,云南土糖除供本省需要外也销往邻省。

出口国际市场。蚕丝是重要出口土产,国民政府力求从土产输出集中外汇,1938年国民政府和四川省政府采取低息贷款、增加投资、实行奖励等方式扶持蚕丝生产。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同盟国对生丝需求迫切,为增加生产、统一收购,1943年国民政府颁布全国生丝统购统销办法,全国所产内销外销改良丝和土丝的收购运销由财政部责成贸易委员会所属的复兴商业公司统一办理。另,1937—1941年广西土糖年均出口6.5万担,比1912—1927年增加近2/3。<sup>⑧</sup> 福建长汀县毛边纸除销往湘粤外也远销南洋,广西那马纱纸出口东南亚、美国等地。

### (二) 农民在手工业生产中据重要地位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学界在关于手工业前途论争中,戴乐仁、顾毓琇、吴知、郑林庄、王达三、费孝通等学者均认为近代手工业是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维持农民基本生活的重要途径,严中平、郭大力也认为农村手工业使农民得以维持生存。<sup>⑨</sup> 当代学者通过对抗战前手工业的研究也普遍认为近代手

① 史建云:《从市场看农村手工业与近代民族工业之关系》,《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1期;彭南生:《论近代手工业与民族机器工业的互补关系》,《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2期;彭南生:《半工业化:近代乡村手工业发展进程的一种描述》,《史学月刊》2003年第7期;李金铮:《传统与现代的主辅合力:从冀中定县看中国家庭手工业之存续》,《中国经济史研究》2014年第4期。

② 张圣轩:《成都工业现状及其发展途径》,《四川经济季刊》第1卷第4期(1944年)。

③ 唐正元:《鄂北手纺织业之推广》,《农本月刊》1942年第57期。

④ 《云南棉产与棉纺织业》,农本局编印:《棉业经济资料参考》第12期,1943年印行,第6—7页。

⑤ 安徽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安徽省志·纺织工业志》,第130—131页。

⑥ 华有年:《夹江的纸业与金融》,《四川经济季刊》第1卷第3期(1944年)。

⑦ 赵国社:《抗战时期自贡井盐业场商融资问题研究》,《盐业史研究》2015年第3期。

⑧ 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广西通志·糖业志》,第2页。

⑨ 李金铮:《毁灭与重生的纠结: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农村手工业前途之争》,《江海学刊》2015年第1期。



工业与农村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在面临贫困化压力,农民缺乏其他谋生之道、从事手工业生产的机会成本几乎可以不计的情况下,大多数农家从事手工业以补贴家用。抗战时期国统区农民在手工业生产中依然占据重要地位,从以下三方面得以体现。

城乡手工业中乡村所占比重较高。以织布业为例,乡村手工业生产者数量、生产工具数量和产品数量均比较显著。成都布业机户 3/4 在乡村(另 1/4 在城内),乡村织户多为家庭式,农闲时开工。<sup>①</sup> 成都城厢内外参加同业公会的机户织机约 0.4 万部,散落乡间的织机约 1 万—1.2 万部<sup>②</sup>。1944 年遂宁农户织布 14.5 万匹,约占土布产量的 1/2。<sup>③</sup>

农户从事家庭副业比较普遍,部分手工业生产也以农户家庭副业为主要生产方式。前者如纺织业、蚕丝业,后者如造纸业。据农林部中央农业实验所统计室编制材料显示,浙江、江西等 15 省农家副业以纺织居多,抗战期间从事纺织作为副业的农家数量占总农家比重自 1938 年的 1/6 提高到 1943 年的 1/3,1944—1945 年约占 1/4。<sup>④</sup> 据四川棉作试验场 1937 年棉产调查,在仁寿、射洪等棉产量较高的县,棉农中 30%—45% 以纺纱为副业,在内江、隆昌等棉产量较低的县,纺纱户占棉农户数约为 10%。<sup>⑤</sup> 陕西农村妇女利用农暇以旧式纺车纺织,织成土布后出售。云南各县农民十有六七织布,是农村家庭妇女闲暇或晚间副业。据 1942—1944 年统计,贵州全省织户有 5.8 万家,均为分散的农村家庭副业。<sup>⑥</sup> 郁林是广西南部土布业中心,郁林土布生产多是作为农家副业的家庭手工业,1937 年鼎盛时期织户超过 2 万户。<sup>⑦</sup> 浙江兰溪县农村从事土纺者超过六千人,平阳农村织布业兴盛,多为农村妇女从事生产。<sup>⑧</sup> 四川改良木车丝厂一般为农家养蚕缫丝者或购茧小规模缫丝者,另有完全使用土法缫丝的大车房,20 世纪 40 年代初期土法缫丝有复兴之势,土丝坊多为农家副业。西充丝织业机户织绸是农家一种副业,1942 年有机户 320 家。<sup>⑨</sup> 据 20 世纪 40 年代初调查,四川省夹江、梁山、铜梁、广安 4 县手工纸厂合计 4 056 家。<sup>⑩</sup> 梁山手工造纸多为农家副业,槽户约 1 165 户(长槽全年雇工造纸,短槽仅农隙时使用家庭劳力造纸,各约占 40% 和 60%),铜梁全县有手工纸厂 591 家,<sup>⑪</sup> 夹江半数及以上农户于农隙时造纸、农忙时停工,抗战时期槽户约 5 000 户,多以手工业小作坊形式生产。<sup>⑫</sup> 1939 年福建全省 47 县槽户共 10 815 户(其中专营槽户和副业槽户各占 22% 和 78%,前者专营纸业,后者为农户农余开槽造纸增加收入),纸工 6.6 万余人(专营纸工和副业纸工各占 19% 和 81%)。<sup>⑬</sup> 1940 年后浙江省槽户造纸,仍属家庭副业。竹子纤维造纸是赣西北一带的一大副业,20 余方里内约有造纸槽 150 所。<sup>⑭</sup> 贵州出产皮纸、草纸、毛边纸等,均为农民农闲时采用旧法制造。广西造纸手工业分为纱纸手工业和竹纸手工业,据 1938 年调查,都安有 15 乡 100 村生产纱纸,纸户 1 111 户,隆山

① 《成都纱布业概述》,《农本月刊》1942 年第 61 期。

② 张圣轩:《成都工业现状及其发展途径》,《四川经济季刊》第 1 卷第 4 期(1944 年)。

③ 冯名书:《三十三年遂宁经济动态》,《四川经济季刊》第 2 卷第 2 期(1945 年)。

④ 其他如从事草鞋草绳作为副业的农家比重在 11.4%—12.8%,木匠在 6%—6.5%。从事土砖陶器和裁缝的农家比重接近,多在 4.5% 左右,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第 4 卷,第 553 页。

⑤ 方显廷:《川康棉纺织工业之固有基础》,《农本月刊》1942 年第 57 期。

⑥ 贵阳市志办《金筑丛书》编辑室编:《民国贵阳经济》,第 232 页。

⑦ 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广西通志·二轻工业志》,第 13 页。

⑧ 浙江省轻纺工业志编辑委员会编:《浙江省纺织工业志》,北京:方志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67 页;寄遥:《浙南平阳手工纺织的再生》,《农本》1941 第 51 期。

⑨ 尹良莹:《四川蚕业改进史》,第 217、338 页。

⑩ 钟崇敏:《四川手工纸业调查报告》,第 15—16 页。

⑪ 钟崇敏:《四川手工纸业调查报告》,第 61—67、107—115 页。

⑫ 四川省夹江县编史修志委员会编纂:《夹江县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223 页;华有年:《夹江的纸业与金融》,《四川经济季刊》第 1 卷第 3 期(1944 年)。

⑬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第 4 卷,第 338—344 页。

⑭ 唐谷:《从枯竭到破产的农村经济》,《经济周报》第 7 卷第 11 期(1948 年)。

有14乡28村生产纱纸,纸户413户,竹纸手工业以融县最为突出,全县造纸作坊有50家。<sup>①</sup>

手工业中相当一部分工人未脱离农业生产。以制盐业和制糖业为例。据1941年估计四川全省盐工有56万余人,据1942年统计四川全省正式登记取得盐工资格的盐工有12万余人,其中直接盐工9万余人,间接盐工3万余人。川东和川北两区盐工多为农民,不作工时以农业为主,兼营副业较为普遍,川康区大盐场的直接盐工大多可依靠专技维持生活,间接盐工在闲班时种菜耕田或挑炭挑盐以增加收入。<sup>②</sup> 云南井盐使用锅煎土法,20世纪30年代实行矿卤国有,招收有实力的商人和灶户组成制盐团体,井场工人多为附近农民,半工半农。四川沱江沿县是川糖重要产区,1940年内江、资中等7县糖房与漏棚合计4100余家,1942年合计(糖房、漏棚、糖房兼漏棚、冰铺)3100余家,1943年1600余家,1945年4000余家。<sup>③</sup> 糖房有乡间粮户自设,也有蔗农合租自行制糖,漏棚所需资金高于糖房,多由有资力的粮户组织,糖房和漏棚工作时间受甘蔗收割季节限制,冰铺生产原料为白糖,不受季节限制,糖房工人均为临时性质、漏棚和冰铺熬糖匠为临时雇请,其他工人有常年雇用者也有短期雇用者。<sup>④</sup> 江西赣南是全国著名土糖产区之一,数家农户组建一糖棚,蔗农兼做工人。福建制糖多以家庭作坊及蔗农合作经营,据1943年调查,福建仙游县有糖房549家。<sup>⑤</sup> 土法制糖业是云南农村的重要副业,糖房分为自种自制(种蔗数量较多的蔗农备置全套制糖工具,家属参与割榨熬制)、合伙榨制(10家或20家蔗农集资购置工具,合设糖房)、专房代榨(蔗农或商人作为制糖商,专设糖房代人榨制)三种。<sup>⑥</sup>

### (三)新旧生产工具和技术并存

中国在引进西方机器大工业以后也自国外引进先进手工工具,或改良旧式手工工具,并在城乡手工业中推广使用,提高生产效率,但因旧式工具价格低廉或使用方便,新旧工具各有其适用性。<sup>⑦</sup> 从以下史料可以看出,抗战期间国统区6种主要手工业生产中体现出传统工具与改良工具、新式工具相结合,旧法与新技术并存的特点。

以传统工具和经一定程度改良的工具为主、辅以新式工具进行生产,这在棉纺织业、蚕丝业和卷烟业中较为突出。四川省棉纺织推广委员会等机构推广七七纺纱机等改良纺纱机,1940年四川七七纺纱机有1.6万余架,1941年增至3.6万余架,1942年达6万架左右。改良纺纱机大多由各地昔日土纺机加以相当改良,不再是纯木质,而是部分零件用铁制的半铁机。一般农户难以负担七七纺纱机以及其他新式纱机的费用,大部分使用改良后的木质机器。成都布业城乡织户织机多为木制。<sup>⑧</sup> 1944年遂宁曾向政府登记的18家纺织工厂铁机270架,木机360架,据估计散机户有铁机30余架,木机2000架以上。<sup>⑨</sup> 湖北官办或商办的纺织工厂和民办的纺织机坊大多使用手摇、手拉、脚踩为动力的木制纺车和铁、木织机。据1942—1944年统计贵州全省土纺纱机15.7万架,木

① 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广西通志·二轻工业志》,桂林:广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12—13页。

② 四川省盐业工会筹备委员会编印:《四川盐工概况》,第23、28—31页。

③ 糖房对甘蔗进行粗加工,生产红糖、糖清。漏棚对糖清进行精加工,生产白糖和桔糖。另有冰铺,对白糖进行再加工,生产冰糖。1942年内江、资中等7县中除内江与资中各有4家使用新法制糖的糖厂外,其他均为沿用土法制糖的糖房与漏棚。内江地区档案馆编印:《内江蔗糖档案资料选编·民国时期》(中),1984年印行,第402、424、499页。

④ 内江地区档案馆编印:《内江蔗糖档案资料选编(民国时期)》(中),1984年印行,第404—405、413页。

⑤ 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福建省志·轻工业志》,第51页。

⑥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第4卷,第262页。

⑦ 吴承明:《论工场手工业》,《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4期;史建云:《论近代中国农村手工业的兴衰问题》,《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3期;林刚:《中国国情与早期现代化》,《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4期;彭南生:《中间经济:近代手工业经济地位与作用的新阐释》,《近代中国》第11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李金铮:《传统与现代的主辅合力:从冀中定县看中国家庭手工业之存续》,《中国经济史研究》2014年第4期。

⑧ 《成都纱布业概述》,《农本月刊》1942年第61期。

⑨ 冯名书:《三十三年遂宁经济动态》,《四川经济季刊》第2卷第2期(1945年)。

织机近7.8万架。<sup>①</sup> 贵阳纺织业使用人力铁机者仅鲁丰布厂和协兴染织工厂两家,铁机合计21架,使用人力木机者有120—130家,木机合计250架。<sup>②</sup> 1940年浙江全省手纺机共2350部,棉筒15万筒,各地将单锭、多锭纺车及木结构的多订筒大纺车也修整重新投入使用。<sup>③</sup> 浙江余姚、慈溪和兰溪等产棉区普遍使用产量较多的余姚式手摇纺纱机,余姚全县有余姚式纺纱机2000部。1941年初余姚全县约有新式手拉机700架、旧式布机4000架、新式手摇纺纱机400余架,经营手拉机者多是田主(少数是商人),棉农所用均是旧式布机。<sup>④</sup> 据1943年调查,重庆173家大织户(铁轮机在10架以上或木机折铁轮机相当于10架以上者,铁轮机数占重庆全市的58%)铁轮机数量是木机的6.7倍。<sup>⑤</sup> 1943年四川改良木机缫丝车共17080部,所产生丝与铁机厂丝类似,另有完全使用土法缫丝的大车房,不少蚕农自行以土造大车缫丝增加收益,四川全省土造大车在最盛时期超过3万具。<sup>⑥</sup> 据1942年9月至1943年2月调查南充全县织绸机共计2064台,其中木机、木龙头机、铁龙头机(木机产出平绸,木龙头和铁龙头机均可织花绸)各占62%、30%、8%。<sup>⑦</sup> 20世纪40年代初安徽阜阳城使用单人操作木推子的零星卷烟户到处可见,六安、寿县等地7家烟厂均自使用手工木机卷烟开始。江西等地以小型木制卷烟设备从事手工卷烟制销,赣州有木锥盒子卷烟机千余架。<sup>⑧</sup> 1942年河南省手摇铁机约330部、手工卷烟木斗约500部,合计全年可卷烟数量是同时期全省机制卷烟生产能力的34倍。<sup>⑨</sup>

新旧技术有不同程度的应用,机器动力和人力结合使用。如制糖业中出现新技术、新设备,推广改良技术,但生产以旧法为主,制盐业中机器生产集中在少数地区和采卤过程,在多数地区和其它生产环节,仍大量使用手工劳动。四川沱江沿县糖房与漏棚均沿用土法制糖。1940年四川全省尚无机制制糖厂,1941年内江新法制糖厂有7家,制糖工具采用四川甘蔗试验场所制离心机,糖清多购自糖房。离心机有手摇式和电力拖动两种,各厂多用手摇机以人力工作,自备小型发电机的糖厂转熬每次提取后的糖蜜仍使用旧式糖锅。<sup>⑩</sup> 赣南、云南、贵州、广西制糖多沿用旧法,1941—1944年广西农事实验场推广改良土法制糖,但农村使用改良法者为数不多。<sup>⑪</sup> 自贡盐场使用蒸汽和电力机车采卤发展较快,1939年自贡盐场每月产卤50余万担,约8/10以上出自机车推汲。<sup>⑫</sup> 与此同时战前自贡一些停废井灶,在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大量起复以求迅速增产。川东、川北和川南大部分盐场采用传统生产方式。自贡两场盐崖井每井每日产卤1200担,机车黑卤井约700担,牛推黑卤井约60—100担,牛推黄卤井约30担,川北盐场多为竹筒小井,每日产卤3—4担,少数大井(广水井)每日每井产卤数十担。<sup>⑬</sup> 1942年川北有盐户9510家,井105460眼,灶8125个,锅46901口,每户有竹筒小井数口至数十口不等。<sup>⑭</sup>

① 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贵州省志·轻纺工业志》,第401页。

② 贵阳市志办《金筑丛书》编辑室编:《民国贵阳经济》,第69—70、76页。

③ 浙江省轻纺工业志编辑委员会编:《浙江省纺织工业志》,第4、67、94页。

④ 茅尘如:《略谈余姚土布》,《东南经济》1941年第11—12期;汤逊安:《战时余姚土布发展的经过》,《农本》1941年第48—49期。

⑤ 张文毅:《重庆市一七三家大织户生产情况调查》,《四川经济季刊》第2卷第3期(1945年)。

⑥ 李守尧:《四川之蚕丝业概述》,《四川经济季刊》第2卷第3期(1945年);尹良莹:《四川蚕业改进史》,第217页。

⑦ 钟崇敏、朱寿仁:《四川蚕丝产销调查报告》,第221页。

⑧ 《江西省烟草志》编纂委员会编:《江西省烟草志》,第65—66页。

⑨ 陈洪友:《民国时期河南手工卷烟研究(1912—1949年)》,博士学位论文,南京大学,2012年,第57页。

⑩ 内江地区档案馆编印:《内江蔗糖档案资料选编·民国时期》(中),第402、424、499页。

⑪ 许桂霞:《民国时期广西制糖业的发展》,《广西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7年第4期。

⑫ 钟长永:《抗日战争时期的四川盐业经济》,《盐业史研究》1995年第2期。

⑬ 四川省盐业工会筹备委员会编印:《四川盐工概况》,第13—15页。

⑭ 李华:《近代四川盐业生产关系的特点》,《盐业史研究》2011年第2期。

### 三、手工业在近代中国社会经济中的地位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学界对中国手工业前途的论争中,严中平、张培刚、陶孟和、杨庆堃认为手工业无法与机器工业竞争,郭大力认为农村副业的存在是工业发展的阻力;李景汉认为大规模的机械工业不能完全替代手工业,王达三、郑林庄、费孝通认为发展农村工业是逐渐向机器生产和都市工业过渡的桥梁。<sup>①</sup>从新中国成立至今,当代学界约有两种观念。一种是直至20世纪80年代前的主导认识,即将手工业视为落后生产方式的代表,是先进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对立面——自然经济的代表。另一种大致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认为近代手工业与机器工业存在互补互动的一面。但是无论何种认识,对近代手工业的研究主要以工业化化为参照。<sup>②</sup>本文尝试在工业化、现代化理念之外分析近代手工业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

近代手工业在社会经济中起着重要作用。战前手工业分布广泛,是近代工业商品生产的主体形式,是近代商品流通的重要来源,这在产值和出口值方面均有体现,抗战时期国统区6种主要手工业大体上比战前有所发展,极大满足了市场需求。战时日军对后方实行经济封锁后运入后方的商品大幅减少,同时国民党政府政治经济重心的西移和沿海人口的大量内迁增加了日用品需求,战争物资需要量也不断增加,国民政府因集中外汇需要扶持蚕丝业生产,归根到底是来自国际市场需求。国统区棉纺织业、蚕丝业、制盐业、卷烟业和部分地区制糖业、造纸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生产和需求相匹配的结果。鸦片战争后至抗战时期手工业在复杂变化的社会经济形势中持续存在,其顽强的生命力意味着手工业是适应当时社会经济条件的一种生产形态。

近代手工业是基于现实约束的一种可行、有效的要素配置方式。国统区主要手工业产品销售范围小至本地,大到全国市场、国际市场,满足不同规模的市场需求,由众多农民采用易获得的传统工具和传承的旧法,与新式工具、改良工具和技术相结合进行生产,与战前相比较,其生产特点具有延续性。中国自然条件利于农业的发展,而地理位置制约着中国古代与周边进行大规模交换基本物资的可能性。随着人口的增加,有限的国内资源相对于人口需求相当紧张,一方面限制了脱离农业生产的非农消费以及城市和非农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人均耕地面积的减少使普通农家仅靠小块土地难以维持日常生活,农民在缺乏其他选择的情况下,通过发展家庭手工业和其他副业,使用闲置劳动力提供日用品或为家庭增收。<sup>③</sup>将鸦片战争后至抗战期间中国手工业生产特点的延续性,与古代小农经济中农业和工副业结合的传统相结合考察,可以看出近代手工业是基于现实约束的一种可行、有效的要素配置方式。在贫困化压力下农户家庭成员劳动不计成本,在边际劳动生产率为零之前投入劳动即可即可视为收益,在外来经济冲击和国内机器工业兴起和发展的环境中,以新旧生产工具和技术并举的方式、以市场为导向从事手工业生产,有效地结合了可用的人力、物力和技术。

手工业生产是吸纳农闲劳动力的重要途径。这既体现在众多农民从事手工业生产上,也体现在

① 相应的,有反对手工业和提倡发展手工业两种政策建议。严中平、张培刚反对提倡农村手工业(杨庆堃主张仅提倡数种具有发展可能性的家庭工业);张世文、戴乐仁、千家驹、李景汉、顾毓琮、吴知、郑林庄、王达三、费孝通主张发展农村手工业。李金铮:《毁灭与重生的纠结: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农村手工业前途之争》,《江海学刊》2015年第1期。

② 部分学者关注到手工业本身,如林刚提出手工业生产方式变化的范围和程度,取决于传统生产方式有效适应生活需要和市场需要的能力;李金铮认为人口压力导致的贫困,是家庭手工业存在的重要基础,历史传承和“农闲”不闲是家庭手工业生存和延续的传统因素。林刚:《传统、变革与国情——对鸦片战争后至抗战前中国手工业的一个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2005年第4期;李金铮:《传统与现代的主辅合力:从冀中定县看中国家庭手工业之存续》,《中国经济史研究》2014年第4期。

③ 林刚:《试论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民族性特征——对中国、西欧资源配置方式演变过程的回顾》,《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2期;林刚:《小农与中国古代社会的商品经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7年第4期。

手工业和工业就业人数、手工业与工业品总产值的对照中。<sup>①</sup> 在中国历史上农民的可行能力集<sup>②</sup>极其有限,从事手工业生产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农民人口庞大,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在当代依然是有待解决的问题。从农村迁移到城市的农民工自 1983 年的 200 万人增至 2009 年的 1.45 亿人,2011 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 2.5 亿人,2017 年增至 2.86 亿人,城市和城镇吸纳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农民工迁移既有流出也有回流,据 1997—2012 年各地调查显示,农民工中返乡者在 16.8%—38.4%,据 2008—2015 年各地调查显示,农民工中有返乡意愿者多在 27.1%—52.4%,返乡农民工中从事农业生产者比例因调查地不同而异,低至 3.9%—7.1%,高达 49.5%—58.7%;据 2007—2012 年各地调查显示,返乡农民工中创业者占 3.5%—25%,有创业意愿者占 43%—73%,返乡创业者多集中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很少选择农业。<sup>③</sup> 农民工返乡是不容忽视的社会现象,从总体情况来看,农民工返乡后以脱离农业生产为主。从农业生产来看,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农业资本—劳动投入比的提高和 2004 年以来农业部门劳动力成本的迅速提高,表明农业越发倾向于节约劳动的生产方式,这使农民工难以返回农业。<sup>④</sup> 农民工人力资本、金融资本普遍偏小,社会资源可获得性有限,可行能力相对缺乏,返乡农民工创业意愿较高,而创业行为实际发生比例较低,所面临的就业困境在一定程度上与近代农民相似。近代手工业是由中国农民在实践中探索出的有效的生产方式,与其经济条件相适应,曾在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中发挥重要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可资借鉴,协助返乡农民工增加人力资本,为其获得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源提供便利,扩充他们的可行能力集,鼓励他们自主探索满足不同层次需求的合适方式。

## Production and Sales of Six Major Handicraft Industries in KMT-controlled Areas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Fan Guo

**Abstract:** In KMT-controlled areas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there were more products or craftsmen, workshops and factories in six major handicraft industries than before the war. The production had three characteristics, which were similar to prewar: The production meet demand in markets of different sizes; A lot of peasants engaged in production. Traditional and new tools and techniques were both used. This paper argues that handicraft industry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modern China, the production allocated factors feasibly and effectively in realistic constraints, handicraft industry absorbed rural surplus labor force greatly.

**Key Words:**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Handicraft Industry; KMT-controlled Areas

(责任编辑:王小嘉)

① 据吴承明估计,1933 年手工制造业就业人数达 788.6 万人,而现代化工业仅吸收 110.6 万人。据解放后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1936 年全部工业职工人数中,现代化工业占 170 万人,工场手工业 254 万人,手工业者 757.9 万人。直至 20 世纪 50 年代初,华北区各类手工业总产值仍相当于地方国营工业总产值的 80% 以上,西南区 6 个大中城市和 20 个中等地方城市中手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各占 59.1% 和 77.9%,福建占 70%,安徽全省日常生活和生产资料中 70%—80% 来自手工业供给,西北地区 90% 来自手工业生产;据 20 世纪 50 年代初调查,在浙江、河南、福建及东北一些县市中,乡村手工业者在城乡手工业者中所占比重,除东北地区为 38% 外,大多在 60%—88%;1954 年中国 2 000 余万手工业者中,60% 以上散布在农村。彭南生:《中间经济:近代手工业经济地位与作用的新阐释》,《近代中国》第 11 辑;陈庆德:《论中国近代手工业发展的社会基础》,《云南财贸学院学报》1990 年第 3 期;陈庆德:《中国近代手工业的发展趋势》,《求索》1991 年第 6 期;安淳:《为什么必须积极发展农村手工业》,《前线》1961 年第 20 期。

② 可行能力指的是个人有可能实现的、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组合,个人的可行能力集由其可以选择的功能性活动向量组成。阿马蒂亚·森著,任贇等译:《以自由看待发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63 页。

③ 数据汇总自 40 多篇论文,数量较多不一列出。

④ 王美艳:《农民工还能返回农业吗——来自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调查数据的分析》,《中国农村观察》2011 年第 1 期。